

## A Prelude to Opening-up: Forty-three Scheme and the Influence on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 开放的前奏：“四三方案”及其对改革开放的影响

陈东林 Chen Donglin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京, 100009

### 内容提要:

20世纪70年代初期, 经毛泽东批准, 在周恩来、李先念、邓小平、陈云等人领导下, 策划、实施了一个从西方国家引进26套化肥、化纤、冶金等成套技术设备的43亿美元方案, 简称为“四三方案”。这次引进过程中批判了极左思潮, 着重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 这次引进规模大, 引进设备技术水平较高, 引进和建设效率较高, 催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引进技术设备、开展经济交流的第二次高潮; 这次引进为改革开放时期提供了对外引进经验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 堪称对外开放的前奏。

### 关键词:

四三方案 技术设备引进 对外开放

**Abstract:** In the early 1970s, with Mao Zedong's permission, a scheme was put into forc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Zhou Enlai, Li Xiannian, Deng Xiaoping and Chen Yun. In this scheme, twenty-six sets of serial technical equipments worth 4.3 billion dollars were brought in for the chemical fertilizer, chemical fiber and metallurgy industries, so it's also known for short as "Forty-three Scheme". In this process, by criticizing ultra-Left trend of thought and solving people's problems in basic necessities of life, the high-technology efficient equipments on a large scale generated the second climax of economic exchange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refore, it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prelude to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for it not only provided experience in importing foreign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but also laid a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improving the people's livelihood.

**Key Words:** Forty-three Scheme; importing foreign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opening-up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共有两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的引进高潮，第一次是“一五计划”时期的156项工程；第二次就是20世纪70年代初引进26个大型项目约合43亿美元方案，简称“四三方案”。

“四三方案”对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前奏。其出台是当时国内国际形势变化决定的。

## 一 国内纠正极左错误与中美关系缓和

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与“天下大乱”的头三年相比，国内政治形势相对稳定，主持中央常务工作的周恩来开始在对外经济工作方面着手恢复和落实一些政策，他首先抓的工作是批判极左思潮。

1970年10月全国贸易会议召开，周恩来在审查会议核心小组报告时多次讲话，批判了一些极左错误言论和做法。这次会议成为对外经济贸易工作走向正常的一个重要转折。当有人汇报说出口商品不加政治宣传标签是搞“中性包装”“造成了政治上的损害”时，周恩来反驳说：有些东西，我们国内不需要，他出的价钱又不低，搞点“中性包装”，又有什么了不起？他还问“四人帮”把持下的上海：你们在商品图案包装上，还用毛主席语录吗？这样出了口，反而会被敌人利用。什么事情搞极端了，总是走向反面。绸子被面上印上拖拉机，谁愿意盖？有人汇报在广交会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是精神变物质时，周恩来说：贸易就是贸易，商人就是商人，资本家怎么能把我们的“精神”拿去变“物质”呢？不要给人印象，好像外贸首先是对外国人宣传，容易强加于人。现在让这些人钻进来做买卖，他们赚了钱，但我们国家强起来了，得到了好处。他要求批“左”的同时，积极扩大进出口，为国家积累外汇。他指出：外汇是国际市场上交换的手段，而且还要支援别的国家嘛。对外汇不能统统否定了，要一分为二<sup>[1]</sup>。

这一时期，国际形势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逐步走向正常化。毛泽东在会见尼克松谈话中批评了国内前一时期闭关自守的极左做法，他说：“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要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sup>[2]</sup>据此，中美上海公报提出双方“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方便”。1973年11月，得到政府赞助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多年来第一次访问了中国<sup>[3]</sup>。

1973年，长达28年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近于崩溃解体。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着生产过剩，产品、设备、技术都急于找出路，对同中国做生意十分感兴趣，这也为中国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创造了有利条件。

## 二 引进26套成套技术设备的“四三方案”

“四三”方案从引进化纤设备开始，是当时解决民生问题的迫切需要。

20世纪60年代起，先是由于“大跃进”失误造成的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经济困难”局面，后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动乱影响生产，棉花歉收，棉布供应持续紧张。因此，我国

城乡居民的穿衣基本需求，一直长期处于紧张状态。许多消费必需品都需要凭票证购买。

国际上发展中国家解决“穿”的问题，主要是靠种植棉花。人多地少、粮食尚未过关的中国，不能拿出大量耕地来种棉花。生产化纤是唯一出路。1959年中国开发大庆油田后，到1972年石油产量高达4567万吨，可以拿出一部分生产化纤。问题在于，没有生产化纤的技术设备。于是，进口化纤、化肥生产技术设备，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瓶颈问题。但“文化大革命”中批判“洋奴哲学”，棍子横行，没有人敢提出进口方案。

在客观条件成熟的必然下，一个时机偶然地到来了。1971年8月毛泽东到南方视察。在长沙，他让身边工作人员到处走走，买东西，回来向他汇报社会状况。有位女服务员说，为了买一条俗称“的确良”<sup>[4]</sup>裤子，排了两小时队，饱尝“千辛万苦”。毛泽东深有感触地问周恩来、李先念：为什么不能多生产一点“的确良”？不要千辛万苦，百辛百苦行不行？周恩来说：我们没有这个技术，还不能生产。毛泽东又问：能不能买生产技术？周恩来马上抓住这个宝贵机会说：当然可以。他立即要经济秘书顾明找李先念、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召集主要工业部门，研究引进化纤技术，同时把急需引进的其他项目都通盘研究一次，搞一个全面规划给他<sup>[5]</sup>。

1972年1月初国家计委组织了轻工部、燃化部、商业部、外贸部进行了讨论调查，李先念、华国锋听取了汇报。轻工部计划组副组长、改革开放后任国务委员的陈锦华组织起草了《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1972年1月16日由国家计委向中央提出。

报告建议：化纤方面，从法国、日本进口4套装置，约需2.7亿美元，放在四川、辽宁、上海、天津；化肥方面，进口2套30万吨大型合成氨厂设备，建在四川和大庆。以上约需4亿美元。这些设备投产后，一年可以生产化纤24万吨，等于500万吨棉花，可织布40亿尺，比棉织品耐用高几倍；可生产化肥400万吨，所需石油气等原料，国内也有保障<sup>[6]</sup>。

这个用打字机打印在普通纸上的报告，开始促动亿万群众的生活发生变化。

1月22日，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联名向周恩来报送了这个报告<sup>[7]</sup>。2月5日，毛泽东立即圈阅批准。两天后，李先念要求余秋里、轻工业部部长钱之光、外贸部部长白相国等组织实施。轻工业部和燃化部组成考察组，到西欧、日本经过两个月的考察，于5月给国务院写出进口化纤设备安排方案报告。5月24日，李先念批准同意，并委派柴树藩主持同外商进行1个多月的谈判，写出《进口化纤设备谈判进展情况的报告》。9月2日，周恩来批示同意，并问“能否提前先搞一套日本化肥设备、一套三菱油化设备、一套日本‘旭化成’（公司）”。9月10日，李先念批准国家计委、外贸部《关于提前从日本进口化肥、化纤设备的报告》。这样，第一批进口化纤、化肥设备的方案确定了<sup>[8]</sup>。

这个方案是1966年“文革”以来的第一次，如同一声发令枪，引起了热烈反响。冶金、燃化、机械、电讯、民航、水电、铁道、三机部、四机部等都写出报告，希望引进技术先进、价格合理、适合中国国情的设备<sup>[9]</sup>。

西方国家对出口项目也表现出极大热情。从法国引进的辽阳化纤项目，在谈判中因为1000多万美元的差价，迟迟没有签订合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时，在宴会上对周恩来说，这个项目将会在全世界引起轰动，希望中国在价格上让步。他的意思是，这个项目将打破西方的封锁。周恩来由此考虑予以同意。的确，项目签订后很多西方国家纷纷希望向中国出口技术设备。

周恩来又在考虑把对外引进规模进一步扩大。钢铁工业是重工业的支柱，但长期加工

设备落后，稍好的板材都要依靠进口。1964年冶金部提出报告，要求引进一米七热轧、冷轧薄板轧机。但“文革”中被王洪文等扣上“崇洋媚外”帽子，结果拖延很长时间自己也造不出来。1972年8月6日，国家计委提出《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说：进口一套新的连续轧板机约需2亿美元，虽然用外汇较多，但与每年进口300万吨钢板所花约3亿美元相比，还是合算的，并可以考虑一次订货分批进口，或先进口两个机组，也可考虑进口旧轧机。8月11日，李先念批示：“为了赶速度，拟同意进口。”<sup>[10]</sup>8月21日，周恩来报毛泽东予以批准，从联邦德国、日本引进一米七轧机。

1972年11月7日，国家计委又提出《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建议进口23套化工设备。这时其他工业部门经过出国考察也各自提出项目。周恩来认为，既然有这么好的机遇，事情就应该做大一点。他指示国务院业务组和国家计委把这些项目合并起来，将“关于进口33亿美元第一方案的报告各送我一一份”<sup>[11]</sup>。

当时任轻工业部党组成员的顾秀莲，46年后回忆时仍然激动地对笔者说：我当时负责轻工业的纺织工业，参加了起草报告，负责纺织部分。余秋里同志改了，李先念同志又改。先后有四个报告，最后周总理要求合并为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太重要了，对我们的开放，有很大作用<sup>[12]</sup>！

1973年1月5日，在1972年引进一系列项目工作进行顺利基础上，国家计委做出了总结和统一规划，向国务院正式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由于这个报告计划用外汇43亿美元，被通称为“四三方案”。经过讨论和修改，3月22日，国务院原则上批准了这个报告。后来又追加8.8亿美元，整个方案共计51.8亿美元。

报告提出了对外引进时应采取的6条重要原则：

第一、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要集中力量，切切实实地解决国民经济中几个关键问题。不能什么都进口，不能撒胡椒面，把力量分散使用了，到头来，什么重大问题也没解决。

第二、学习与独创相结合。……有重点地引进一批新技术，可以争取时间，使我国的生产技术，由现在的四五十年代的水平，提高到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

第三、有进有出，进出平衡。……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从这些进口设备投产后所增加的工矿产品中，拿出一部分来扩大出口，是能够做到外汇收支平衡的。

第四、新旧结合，节约外汇。……进口设备，要以引进新技术为主，但在有利条件下，也可以买些半新不旧的，只要国内急需，价格相宜，也可以派人认真考察后购买。

第五、当前与长远兼顾。……从长远看，进口设备，增加国内生产，比进口成品合算。

第六、进口设备大部分放在沿海，小部分放在内地。……沿海工业基础好，可以使进口设备尽快投产，尽快仿制；……沿海工业发展得快一些，从长远看，对促进内地建设是有利的。<sup>[13]</sup>

这些原则不仅是当时引进技术设备的指导方针，而且对以后乃至改革开放时期的对外开放，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报告对各部门引进的规模进行的安排是：石油、煤炭、冶金、发电、交通运输等基础工业方面27.5亿美元，占进口设备投资的64%；支援农业方面5.65亿美元，占13.1%；轻工业方面9.85亿美元，占22.9%。

这样，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四三方案”项目全部出台，其中26个大项

目，都是投资人民币一亿元以上的特大型项目；投资1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有：辽阳石油化工总厂（29亿元人民币）、武钢的一米七轧机（27.6亿元人民币）、大庆化肥厂（26.7亿元人民币）、上海石油化工总厂（20亿元人民币）、天津石油化工厂（13.5亿元人民币）。

周恩来强调，这批引进项目对外履约，一定要重合同，守信用，不能把事情办坏。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建在填海造地的软土层。日本商人反映那里的地基不好，打了很深的柱，仍怕出事故。周恩来十分着急，批示并找人当面交代，一定要采取措施确保工程质量，千万不要出事情。

“四三方案”所需资金是个大问题。过去中国遭受西方封锁，都是用第三国货币结算。1973年6月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洛克菲洛和中国银行董事长乔培新达成谅解：中国银行可用大通银行直接办理汇款和支付旅行支票。6月29日，周恩来会见洛克菲洛，赞赏地说：“通过两国银行来推动两国贸易的发展，这是一个有效的渠道。”“我们的国家社会制度不同，在不同政治制度基础上怎么找到有利于双方发展贸易的办法，这需要研究对方，了解对方。”<sup>[14]</sup>当时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产品过剩，急于找市场，愿意赊帐卖给中国，等建成投产再还本息；或者延期付款。后来中国发现对方也是银行贷款，就改为自己直接从银行贷款，减少了中间差价<sup>[15]</sup>。

“文化大革命”后期相继恢复领导工作的陈云和邓小平，对“四三方案”的引进和建设也给予了坚决的支持。

陈云强调，要注意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和旧中国的经验，做好考察工作。他在国家计委一米七轧机和旧轧机订购报告上批示：“如要买旧轧机先要派人去看清楚哪些设备能用，哪些不能用，事先准备好新配件。过去旧中国有过买旧设备的经验，例如南京的永利化工厂、山西阎锡山的太原钢铁厂、山西的窄轨铁路。据侯德榜说永利厂的设备是便宜的，但要花很大力量到国外去看和检看拆卸装箱。所以我们买旧轧机要慎重从事。”陈云特别强调注意同时进口配套的设备和零部件，以免被别人事后卡脖子。比如进口旧轧机，要“估计到旧轧机的地下电缆等设备拆下时可能已坏了，用不上。”<sup>[16]</sup>周恩来十分重视陈云意见，批示“交计委立即执行，随时检查”。

1973年6月，刚刚复出担任国务院领导工作两个月的邓小平来到上海石油化工总厂视察。他认真听取了引进设备的谈判，投产以后预计受益，投资、年利息，厂区、生活区布置，污水处理和污染问题，进口设备运输等情况，然后实地考察了规划区。对进口的9套大型装置，他询问：超大、超重设备有三四层楼高，没有大平板车，怎么运到施工现场呢？工地负责人介绍说：上海老工人设计出巧妙的装运方案，通过黄浦江转入张泾河把各种超长、超重的塔罐运到工地。邓小平听了以后，称赞老工人了不起。回到北京后对谷牧说：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建设进度很快，要以国务院名义在金山主持召开一个现场会，介绍他们的经验，推动基本建设战线的整顿工作，各省、各部都参加<sup>[17]</sup>。

### 三 “四三方案”引进项目的特点、意义和教训

“四三方案”引进项目的特点是：

第一，着重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长期以来，为了工业化大局，我国重视发展重工业、工业，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纺工业、农业相对发展慢一些。这次引进重点主要

是化肥和轻纺工业，转到了解决人民吃饭穿衣的项目上，用汇占总额的50.7%，冶金及能源工业降到了次要位置，各占20%左右<sup>[18]</sup>。建设在三线地区的四川维尼纶厂、四川化工厂、泸州天然气化工厂、赤水天然气化肥厂、云南天然气厂、湖北省化肥厂、洞庭氮肥厂等，虽然也是三线企业的重点项目，但目的明显与为战备服务不同，是为农业和人民生活服务的。

第二，引进规模大。引进26个大型项目，通过国内配套和设备改造，加上利息，金额达50亿美元。总投资当时折合人民币214亿元。相当于1972年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51.9%。用汇相当20世纪50年代引进用汇的2倍。其中，一米七轧机是新中国成立至当时最大的引进项目，工程总概算为38.9亿元人民币。这些引进成套设备在短时期成倍地提高了生产能力。如1979年与1977年相比，全国化纤产量增长70%以上，塑料产量增长130%以上<sup>[19]</sup>。

第三，引进的设备技术水平较高。基本上是国外20世纪60—70年代的产品，具有大机组、大系列、高速、高效、自动控制、热能综合利用程度高等特点。例如，从西德和日本引进的一米七轧机成套设备，是国际上20世纪70年代初的先进技术，具有高速化、连续化和自动化的特点；氮肥工业引进了美国凯洛格公司在60年代中期开发的以轻油和天然气为原料的年产30万吨合成氨的大系列装置。

第四，引进和建设效率较高。“四三方案”在“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下，也经历了诸多波折，但相对于国内自建项目还是比较令人满意。1979年“四三方案”26个大项目的引进合同执行完毕，合计用汇39.6亿美元，比计划用汇少了3亿多美元。“四三方案”的26个引进项目建设工期相对也比较快。平均建设工期为3年零8个月，最长的不过5年。而国内大中型项目建设周期平均为11年半。又如引进的13套大化肥工程，平均建设周期为3年4个月，而1971年以来自建投产的19个中型氮肥厂平均建设工期为5年零10个月<sup>[20]</sup>。

第五，以“四三方案”为契机，开始扭转前一时期过分强调战备的布局和投资倾向。根据“四三方案”的第6条原则，引进大型成套设备主要放在大庆、盘锦、胜利油田、鞍山、本溪、攀枝花、武汉、唐山、邯郸、南京、马鞍山矿区及山东渤海湾、山西、北京、上海、天津、兰州、安徽、广东等沿海省区。使沿海和东北等一线地区自国家实施三线建设战略以来第一次大规模补充技术设备的新血液。26个大项目布局也比较合理，一是考虑原有地区经济及技术水平状况，大部分引进设备放在沿海或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二是根据原料供应等因素，确定设备安装厂址，如以醋酸乙烯设备建在四川，另外两个建在贵州和云南。在“四三方案”带动下，从1972年到1974年，国家“四五”计划投资指导思想和指标开始修改受极左思潮影响的过分强调战备，对前一时期国防工业和三线建设摊子过大的问题进行了调整。1973年用于沿海地区和三线地区的投资比重已经大致持平，1974、1975年用于沿海地区的投资则大大超过三线地区<sup>[21]</sup>。

“四三方案”的实施，带动了对外经济工作的全面发展。从1972年起，我国的外贸、金融及有关的其他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引进技术设备、开展经济交流的第二次高潮。

1. 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方面，除“四三方案”的主要项目外，重要的引进项目还有：从美国引进彩色显象管成套生产技术项目；利用外汇贷款购买新旧船舶，组建远洋船队；购买英国三叉戟飞机，增强民航运输力量；从英国罗罗航空公司进口斯贝军用发动机制造技术；从美国引进我国急需的两个卫星地面接收站、飞机惯性导航设备等。同时，在国内恢复举办先进科技国家的技术贸易展览会，学习吸取国外先进技术。着手派遣留学生到美

国、西欧学习、深造。

2. 大规模的对外引进促进了我国的出口基地建设。1973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颁布了《出口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和出口工业品专厂的试行办法》，首先在广东佛山地区试办了第一个出口商品生产综合基地，随之又建立了渤海垦区生产基地和河南生猪生产基地，并在全国其它地区陆续建立了一些单项农副产品出口基地和出口工业品专厂、专车间。出口基地的建设，不仅为“四三方案”引进项目提供了宝贵的外汇支持，而且在改革开放时期，这些出口基地成为出口骨干，成为试验特区借鉴的样板。

3. 促进利用和借鉴外国现代金融和管理手段。如陈云这一时期大胆指出，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货市场。他说：“国际市场上的交易所是投机商活动场所，但也是一种大宗商品的成交场所”。“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sup>[22]</sup>根据这一思想，外贸部门在购买国内需要物资如砂糖时，不是像往常那样购入现货，而是先购入期货，再购入部分现货，待到砂糖价格大幅度上涨后，再将期货抛出。这样，既完成了购买任务，又为国家赚取了外汇。

在“四三方案”的带动下，1973年到1975年，我国对外经济工作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1973年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09.76亿美元，是1970年45.8亿的2.4倍；1974年更达到145.7亿，是1970年的3.2倍。这为我国80年代经济建设的腾飞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由于经验不足和条件限制，引进工作中也存在一些值得汲取的教训，主要是：一，重视设备、物资的引进，忽视引进技术专利以及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二，一些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不够，引进后不能与国内生产配套，设备利用率低，工期延长，甚至下马；三，在进口先进技术装备的同时，没有注意学习外国的科学管理经验和操作技术。

#### 四 在引进中与江青集团的艰难斗争

当周恩来、邓小平等为开拓我国对外经济工作的新局面而努力时，“四人帮”却对对外经济工作的开展不断干扰破坏。江青集团炮制“蜗牛事件”和“买船风波”，对大庆化肥厂无端指责、干预，严重影响和打乱了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工作的部署。1976年初，“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四人帮”更加对领导“四三方案”的已逝世的周恩来，及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华国锋、纪登奎、谷牧等中央领导人进行猛烈攻击。

2月下旬，张春桥在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一些大军区负责人“打招呼会议”上，混淆是非，攻击进口成套乙烯装置和出口原油是“买办资产阶级”，“比蒋介石还厉害”。3月2日，江青在十二省市区负责人会议上讲话说：“邓小平把咱们的原油，咱们的石油，连煤炭，棉布统统压价出售。这些都是去年冬天干的。……所以我说他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叫他汉奸，正确不正确？我们的主席还在保着他啊，我说话是我个人的意见。”

1975年，邓小平设想从国外引进部分煤矿设备，采取延期付款、出口煤炭方式偿还。此事却被“四人帮”说成是出租矿山。1976年3月7日，张春桥在接见外宾时说：“他们还考虑进口外国的设备来开采一些煤矿，用开采出来的煤炭换外汇偿还，这种办法同台湾蒋介石集团没有多少区别”，“那是殖民地经济”。

1976年3月13日，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工业生产和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四

人帮”以批邓小平为名，向华国锋、李先念等人集中大肆发难。姚文元在会上质问：“你们究竟要把哪个矿山租给外国，租给哪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是日本、德国还是苏修？”谷牧解释说绝无出租事。江青又说：“我国出口石油把国际能源危机转嫁到中国人民头上，得罪了第三世界，救了第一、第二世界的命！”事实上，1976年第一季度出口石油比去年同期只增加了16万吨，主要增加给朝鲜、罗马尼亚等国。全年出口量在世界原油生产中只占0.35%，根本谈不上对世界和国内燃料危机有影响。但是，“四人帮”仍然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解决这个问题。4月，国家计委提出报告，指出国内燃料危机是因为国内铁路运输堵塞，有煤运不出来，至少拿原油顶煤烧，而不是多出口了原油。“四人帮”仍然在7月23日《人民日报》《情况汇编》上组织文章攻击出口石油、煤炭是出卖国家资源。

江青针对“四三方案”引进设备的安装，追问说：“把美国的化肥设备装到大庆，是给大庆抹黑，这不是丢人吗！”“是谁批准的？”康世恩找石化部副部长孙敬文商议对策，找到了毛泽东用红铅笔圈阅的报告，上面还有“四人帮”自己的圈阅。报告复印送江青后，江青看了才罢休。

1976年5月31日、6月25日国家计委继续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时，张春桥又指责华国锋说：“大项目进口多了，挤在一起，你们不检讨，不能令人信服。”还说引进化纤设备放在上海金山卫，“我一直投反对票”。华国锋忍无可忍地指出：“进口的大项目是经毛主席批准的。不能说不对，不能批过了头。”张春桥马上反驳：“你们总是拿主席压人。”王洪文说：“外贸的库存那么多，外国哪个资本家会这样搞，洛克菲勒也没有那么多！”姚文元说：“中国劳动人民的果实，部分送给了外国资本家。”<sup>[23]</sup>

粉碎“四人帮”后，李先念曾感慨地说：“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想引进一些东西简直难于上青天。”<sup>[24]</sup>可以说，以“四三方案”为中心的第二次大规模对外引进，是在和极左势力的艰难斗争中进行的，也是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斗争之一。

## 五 “四三方案”对改革开放的重大影响

“四三方案”不仅对当时的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对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成功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 （一）批判“左”倾思潮，为对外开放扫除理论障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外经济工作领域取得了重要成就，也形成了一些“左”的理论认识错误，主要包括：

首先，社会主义国家关于对外开放的论述，存在着理论和实践的局限。斯大林于1924年提出一个特殊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内建成。在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以后，斯大林又认为，在社会主义各国工业高速发展的条件下，“很快会使得这些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自己还会感到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多余商品输往他国”<sup>[25]</sup>。从而把与西方国家经济交往看作可有可无。

其次，中国共产党内也存在着过分强调自力更生，排斥对外引进、学习的倾向。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长期处在被围剿和封锁的根据地状态，不得不依靠自力更生。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西方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封锁，实际是一个世界范围的根据地。依靠自力更

生搞经济建设的传统，很自然地被继承和发扬。苏联援建 156 项重点工程，使我们有了社会主义国家范围内的对外引进和开放，但很快就遭到苏联撕毁合同、撤回专家的打击。因此，对与西方打交道，产生了反控制的戒心，过多地强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相对封闭状况就成为一种“形势大好”的理论标志了。

“四三方案”带来了对外经济工作新认识，为 80 年代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作了重要思想准备，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指导思想方面，有积极引进学习国外先进设备和管理经验，认真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等；具体政策方面，有进口国外原料、利用国内劳动力加工后再出口的来料加工，利用国外先进设备和资金开发国内资源的“补偿贸易大政策”，利用资本主义信贷、期货、商品交易所等金融手段，都在改革开放时期得到宏扬和充分运用。邓小平曾说：“说到改革，其实在 1974 年到 1975 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sup>[26]</sup> 胡乔木更具体地解释说：“实际上内容不但包含了改革，也包括了开放。当时主要是指对外贸易，首先是引进国外先进设备。”<sup>[27]</sup> 因此，可以说，“四三方案”是 80 年代改革开放的一个前奏。

## （二）为改革开放时期经济腾飞准备了物质和技术基础

“四三方案”引进的项目，从 1974 年起分别建成投产；到 1979 年底，已有 20 个建成投产；到 1982 年，26 个引进的成套项目全部投产。产能恰好在改革开放之初发挥最大作用，为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腾飞准备了物质条件。

首先，“四三方案”引进项目的投产，使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能够迅速地缓解了 10 亿人口吃饭穿衣的温饱问题。

吃饭方面，化肥产量不足，成为制约我国粮食增产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家每年都要花费 10 多亿美元的外汇进口化肥，仍然不能满足需要。“四三方案”中 1977 年底已投产的 7 套大化肥生产设备，到 1978 年 6 月，累计生产尿素 361 万吨。以后又继续引进，结合国内的国产化设备配套，大化肥设备总数达到 33 套，年产尿素 1593 万吨。按照 1 比 4、1 比 5 的增产效果计算，1593 万吨尿素可增产稻谷近 6500 万—8000 万吨，增产效果十分显著<sup>[28]</sup>。1980 年我国每亩耕地化肥投入量比 1970 年增长了将近 3 倍，使每亩粮食增产 47%，每年增产粮食达 500 亿斤，相当于中国人每人每年增加口粮 60 多斤，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民能够基本摆脱了困扰我国多年的粮食问题，其中原因除了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因素和推广袁隆平杂交籼型水稻外，“四三方案”引进项目无疑也起了很大作用。

穿衣方面，1972 年中国年产化纤只有 13.7 万吨，仅占全国纺织原料的 5.5%。1965 年全国人均纺织品年消费量为 19 尺，“四三方案”的 4 套化纤设备和 2 套石油化工设备全部建成投产后，全国人均纺织品年消费量提高到 32 尺。1984 年中国就能够宣布取消长达 30 年的布票制度，“四三方案”居功至伟。

其次，“四三方案”为支持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飞跃增长及扩大对外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四三方案”，中国真正对西方先进技术有所了解，经过学习，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研究利用外资、借鉴国外现代金融和先进管理手段，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如武钢在一米七轧机工程完成投产后，引进的先进技术还在国内同行业中得到推广和移植，推动国内轧钢、炼钢技术进一步发展，中国的轧钢水平从 50 年代一步跨进了 70 年代。

再次，通过“四三方案”，为国家和地方培养了一大批对外开放的人才，造就了一支对外工作的队伍，积累了很多经验和教训，为以后的对外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合作与竞争，

作好了必要的人才准备。走出去考察，请进来培训，培养的人才、训练的队伍，开始从西方发达国家学到了先进技术、管理知识，初步积累了同西方发达国家打交道的经验，懂得了同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的一些门径。据陈锦华回忆，参与领导1978年对外开放的很多技术骨干，都是从参与“四三方案”的业务人员中调去的。

总之，以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先念为代表的领导人顺应人民的意愿，在逆境中推进对外经济工作取得突破，其意义不仅在“文化大革命”的困难环境中继续了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国际化进程，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更为重要的是，为以后的对外开放，创立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这个价值，在我们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必须给以充分的评价。

注释：

- [1] 外贸部档案：周恩来在全国贸易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0年10月）。
- [2]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595页。
- [3] 苏少之：《中国经济通史》第十卷下，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23页。
- [4] 即涤纶（Terylene），是合成纤维中的一个重要品种，也是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聚酯纤维的商品名称，主要用于纺织。
- [5] 参见陈锦华：《国事忆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9页。又见顾明：《历尽艰辛创四化》，《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18页。
- [6] 国家计委档案：《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1972年1月16日）。
- [7] 国家计委档案：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联名向周恩来报送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的报告（1972年1月22日）。陈锦华《国事忆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3页）写作“1月22日，报告由国务院业务组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三位署名上报”。
- [8] 参见田伟：《“四三方案”的出台经过》，《中共党史资料》2004年第2期，第24页。
- [9] 陈锦华：《国事忆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 [10] 国家计委档案：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报告（72计计字168号）：《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1972年8月6日）。
- [11] 国家计委档案：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报告（72计计字296号）：《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1972年11月7日）。
- [12] 陈东林采访顾秀莲记录（2018年3月10日）。
- [13] 国家计委档案：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72计计字359号）：《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1972年12月22日修改稿）。
- [14] 《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642—646页。
- [15] 90年代李海文采访华国锋记录。
- [16] 国家计委档案：陈云对国家计委关于进口一米七轧机报告的批语（1973年9月3日）。
- [17] 参见陈锦华：《国事忆述》相关部分。
- [18] 苏少之：《中国经济通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23页。
- [19] 陈慧琴：《技术引进与技术进步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第70页。
- [20] 陈慧琴：《我国三十年来技术引进工作经济效果初步分析》（上），《工业经济管理丛刊》1981年第5期。
- [21] 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第244—245页。
- [22]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2页。
- [23] 以上均据国家计委档案：国家计委核心小组给华国锋和中共中央的报告（1976年10月31日）。
- [24] 雷厉：《历史风云中的余秋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39页。
- [25] 《斯大林文选》（下），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594、595页。
- [26]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5页。
- [27] 《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48页。
- [28] 陈锦华：《国事忆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16—22、34—35页。

（责任编辑 冯 峰）